



新世纪青年文丛



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王列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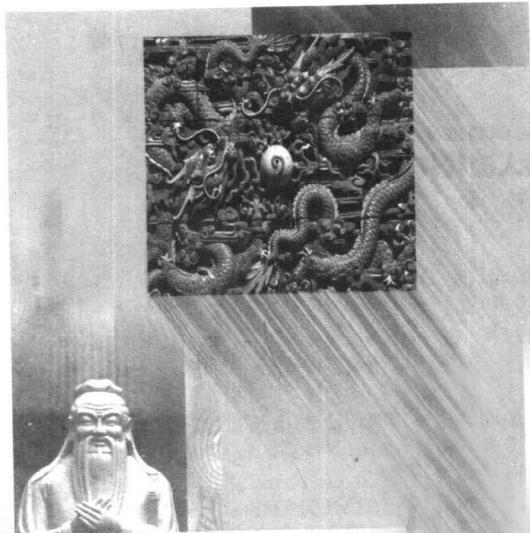
四川人民出版社

B022
2

78532

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王列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王列生著 .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2
(新世纪青年文丛)
ISBN 7-220-05332-0

I. 中... II. 王... III. 农民-意识-研究-中国
IV. B0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0117 号

ZHONG GUO REN DE JING SHEN JIA YUAN

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王列生 著

责任编辑	侯安国
封面设计	文小牛
技术设计	古 蓉
责任校对	伍登富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 3 号)
网 址	http://www.books.com
防 盗 版 举 报 电 话	E-mail: scrmcbsf @ mail. sc. cninfo. net (028)6679239
印 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30 千
版 次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7-220-05332-0/B·233
定 价	12.00 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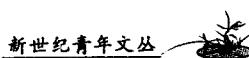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出版前言

伴随着新年的钟声，人类跨入了新的世纪，新的千年。新世纪将是一个飞速发展的世纪，人类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将超乎人们的想象。

由于信息网络化技术的发展，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电子商务把全世界的商家联结在一起，寻常百姓也开始编织网上生活，尽情享受信息革命带来的阳光雨露；人们读书看报的闲情逸趣将逐渐远去，代之以更为迅捷的网上阅读；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和巨无霸型跨国公司的层出不穷，催生了经济的全球化时代；在科技的推动下，战争的形式将发生变化，网络斗士、电脑黑客将充当披坚执锐的士兵，网络入侵、电子战将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人类在充分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开始品尝环境灾难酿成的苦果；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价值观、伦理观将在新世纪、新文明的冲击下面临危机，人们将开始探求新的精神家园；美国、北约推行的新战略，使国家主权受到严峻挑战，让许多人忧心忡忡；新世纪美、俄、欧、中、日等大国的命运也变得扑朔迷离……

新世纪的变化实在太多，让人目不暇接；新世纪有太



多的精彩，新世纪也有太多的无奈。但无论新世纪如何变幻莫测，中国都将披荆斩棘，勇立潮头，追寻文明富强的梦想；新世纪的中国新青年都将直面现实，激流勇进，迎接挑战，为中国的文明富强奋斗不息。为此，我们约请首都知识界、新闻界的中青年学者撰写了这套大型丛书。名为“新世纪青年文丛”，意在介绍新世纪各个领域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新趋势、新理论及其给社会带来的冲击，并为新世纪青年如何应对这些冲击提供知识和精神准备。丛书注重前瞻性、学术性、权威性，以期使广大知识青年了解世界发展趋势，弄清中国国情，掌握新知识，在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前，不会措手不及。

新华社的刘明先生向我们提出了丛书的出版设想并提供了许多帮助，各位作者精益求精的写作态度使本丛书具有较高的水平，在丛书付梓之际，一并致以衷心感谢。

热忱欢迎广大读者对丛书的策划、写作提出宝贵意见！

四川人民出版社青年读物编辑室

2000年9月



新世纪青年文丛



青年文从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成都

目 录

第一章

问题“提及” /1

第二章

在“诗人”与“农民”之间 /8

第三章

在“神”与“农民”之间 /21

第四章

所谓“诸子百家” /37

第五章

庄子为证 /52

第六章

胡适为证 /64

第七章

以桐城地域为证 /75

第八章

“焚书坑儒”事件 /90

目 录

第九章

汉儒设计思想框架始末 / 103

第十章

“仁”说 / 126

第十一章

“孝”说 / 140

第十二章

“义”说 / 155

第十三章

佛学东渐 / 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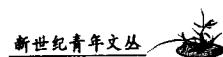
第十四章

不是总结的总结 / 189

第一章 问题“提及”

之所以提起“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一个很重要的当代背景，就是90年代中期由知识分子叙述圈提及过“人文精神”，也就是开展了所谓“人文精神大谈论”，其中一个命题谓之“守护精神家园”。一些诗意祈求者，偶尔会把这个“守护”改为“守望”，以延续一种欧洲文化背景的隐喻魅力，并在这种延续中表明一种立场，一种态度，乃至一种无奈和孤独感。

我何以要用“提及”这个轻描淡写的词汇，是因为我很担心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某种莫名其妙的自信心会使问题膨胀，一旦膨胀，无限的命题乐趣和命名权力就会席卷而至，千百万无辜的阅读者就会有文化暴力的“杀身之祸”，所以在叙述这个事实时，就特别小心翼翼地使用“提及”，以维持事物进程的自然状态。说到底，“人文精神”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体验相去甚远，而与其谈论的语义空间则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就像八十年代以来的文艺心理学压根儿就不着心理学的边际一样，就像没有一个当代文艺心理学家能做最简单的规范心理实验一样，人文的时下论者及其所谈论的人文精神，同样不过是一种叙事层面的策略性游戏而已，至多不过怀抱着对东方农民



的温情依恋。所以只能是提及，一种附着和相关性，与文化发明或文化能量冲动不在同一价值系内。

从某种意义上说，谈“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比谈“人文精神”要容易得多，因为前者无疑拥有民族自身的古典意义作为支撑，似乎历史归纳至少对我们而言或许可以企及，而后者却要求我们回味近几百年的欧洲生存，但我们的祖先以及遗传至今的我们并未体验过这种生存。那么所谓“回味”究竟又有多少可能呢？热衷此项动议的知识精英们，只好依仗文本的能力，肯定间接进入的完全真实叠合。于是一方面是活生生的欧洲被他们切成用语词作为边界的数不尽的碎块；另一方面则是这些碎块突然就不知不觉地具有了图腾功能，成为我们的信仰力量和未来幸福的座标。

然而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涉身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实际上又非常困难。作为叙事中心指称的“中国人”，茫然浩渺，既纠且缠。或许我们在考虑血统的中国，那么成千上万漂洋过海的子民，在异域的国籍登记中代代繁衍生息，又如何与今天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共同其血脉饱经其沧桑？所以在我们的命题框架内，“中国人”概念事实上不可能按照血脉族源来确定其边界，因为在精神层面上，一些中国血脉与另一些中国血脉已经隶属于完全不同的结构范畴。或许我们在考虑政治的中国，审视所向，不过那周之文武，秦之一统，或稍逊如唐宗宋祖，中兴的康乾，大一中华帝国的千古威严携带着作为日常基本方式的



百姓善良质朴，构成国家外延的设定讨论范围。问题是，开放的现代使动态化的人群越来越不受国家的绝对制约，日趋复杂的移民现象更使这种讨论变得扑朔迷离，更何况作为国家的中国在其历史线性过程中时胀时缩，所以我们在这里同样不能寄予全部希望。比较容易使交流双方都可以接受，同时又给写作带来一定方便的办法，就是再一次提出“文化中国”这一大而无当的老命题，模糊语义方法至少在目前会在文本框架内行之有效，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退后选择。社会亦如人生，并非没有理想化的极端形态，而是这种极端形态可望而不可及，日常琐屑与道义大事一样，多数情况下都不可能是择善之从，更多地只能是权且为之姑且从之。

总之，我不能不首先遗憾地告诉我的读者，我的写作在这里既是无奈的开始亦将无奈地结束，惟一的文本意义在于，我不仅体验着中国问题的无奈而且还试图把这种体验说出来。

进入精神家园之前得首先进入家园，没有家园就只能漂泊。尽管漂泊也是人类的一种文化栖居方式，甚至在特定情况下会散发出生存的浪漫诗性，如现代电影所常常乐于渲染的“吉卜赛女郎”所表征的民族隐喻（这隐喻中包含着文化优势主义者对弱势生存的残酷性文化暴力），但从根性意义上说，它非常有害于人类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那一丝温存和兼容。

中国人的家园曾经被马克思统辖在“亚细亚羊圈”之



内，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血缘氏族的生存方式是这一结构的基本经纬。显然，马克思老人至少是审视中华历史凡数千年后所得出来的总体印象，而我们必须沿着这一印象更深入细致一步，寻觅中国人的最早栖居。

几乎在整个旧石器时代，从早期的“蓝田猿人”和“北京猿人”，到中期的“大荔人”、“许家窑人”、“丁村人”、“长阳人”、“马坝人”和“桐梓人”，再到晚期的“山顶洞人”，尽管他们在漫长的挣扎和磨难中，艰难地完成了从早期智人向现代智人的伟大进化，但依然没有从地穴里走出来，即始终过着居之无“屋”的洞穴生活。简单的石器工具抵挡不住自然野生力量的各种挤压，家都不可能又哪里谈得上什么家园。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成就极为辉煌，覆盖面异常广阔的八个区系，几乎都可以作出较为完整的文化描述。在渭河流域、豫西和晋南地区，深入发掘的有“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在豫中及其周围地区，形成发掘规模的则有“裴李岗文化”、“大河村一期和二期文化”、“秦王寨类型文化”、“王湾类型文化”。在冀中、冀南和豫北地区，先后成功发现有“磁山文化”、“大司空一期文化”、“后岗一期和二期文化”。在黄河上游地区，面目基本完整的有“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在黄河下游地区，大有收获的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越来越引起考古学关注的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



“青龙泉三期文化”、“桂花树三期文化”、“鄱阳湖和赣江流域文化”。在长江下游地区，近期发现颇丰的有“薛家岗文化”、“北阴阳营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在华南地区，闪光之处有“石峡文化”、“西樵山文化”、“大龙潭文化”、“昙石山文化”、“圆山文化”。在东北地区，少为人知实则成果不凡的有“红山文化”、“富河文化”、“昂昂溪类型文化”。这些文化的时间断层，一部分已淹没在所谓“五千年灿烂中华文化”的表达范围之内，是看得见摸得着而且相隔已不算十分遥远的历史事实。在这些“事实”中，石器和陶器的丰富表明了中华民族的文明长足进展，而水稻、蚕豆、芝麻、花生、西瓜子、酸枣核和葫芦等农作物种子的发现，则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那时的农业水准已达相当程度。如果我们比较全面地阅读一下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或者哪怕是细心地阅读一遍某一版本的中国考古学通论，我们将不难发现，远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已经拥有耕作式农业的辉煌，他们早已把打猎看做是副业，而捕鱼的传统似乎又要晚得多，因为中国人的海洋意识从来都非常淡漠，甚至常常流露出严重的海洋恐惧情绪。但是中国的农业辉煌从一开始就几乎达到了颠峰状态、成熟状态，这不仅体现在农产品的广泛种植和衣食有安，而且体现在作为农业载体的土地直接切分出中国古典社会形态的具体生存结构，切分出氏族和领地，宗法制和分封制，婚姻习俗和家庭单位，利益交换和利益可比性，乃至幸福目标和



社会理想信念。新石器时代的庞大农业空间和完整的农业化社会结构，确保了古代中国与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伦一道成为四个“早熟的儿童”（马克思称赞古希腊神话时的引譬辞令），或者说四大文明形态，同时也奠定了未来几千年农业持续延伸和阶段性发展的牢固基石。

自商周直至晚清，中国社会基本上保持着农业社会的品格，只不过社会内部更细密更繁富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由天子及至庶民，由骚人墨客及至娼丐，几千年的中国人事实上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说中国人都是农民，在广义上和根性上显然是成立的。

别看九五至尊的历朝天子，居深宫俯视天下，以超越民间的政治神秘力量支撑其美伦美奂、绝色佳人相拥的日子常常不知天上何日人间何年，指点江山时立刻会有千军万马的厮杀，仿佛世界人间不过掌股之间的把玩，所有这一切，似乎与田埂泥边的乡野农民相去殊远。其实不然，他们仍然只能是正在高贵或正在享乐中的农民。一句“率尔天下，莫非王土”，就十分清楚地暴露了他们的土地依附，而那三宫六院七十二妃，龙子龙孙以及太子嫡传制，更进一步表明，其实所谓皇上，只不过就是由家族膨胀为国家的地主。柳宗元《封建论》说，“天下国家，本同一理”，就是以中国社会作为问题背景持论的。

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政治，离传统的封建框架和宫廷体制，有着遥远的距离。当我们站在中国背景和当下时空位置思考问题时，不管你如



何地不愿意牵扯，但是都无法逃避滞重农业之疆的幽深，甚至时时会使现代性话题不经意间陷落农业泥淖。历来的知识分子在从事批判性谈论时，总是先寻找到一个超然物外居高位置，以为自己就可以扯着尾巴飞翔到太空中去，或者至少会完全像白种人那样不食炎黄留下来的粟米。其实这也是一个神话，谁都做不到这一点，胡适做不到，李泽厚同样也做不到，更何况如今的我们呢？

第二章 在“诗人”与“农民”之间

谈到这里，不能不寻找一个论述角度来解剖一下传统知识分子。我最想选取的是农事诗，因为大量的中国文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写过这种题材，并且在这种题材里最真切地倾诉着他们的人生理想和精神所归。这个文学个案既能揭示出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也能反映出他们的精神方式和价值指向，尽管我们在文字叙述过程中不得不冒议题走窄和叙述晦涩的风险。

我们知道，中国文学的厚重，已愈来愈为中西研究家所共同首肯，其堂奥之幽深，只需稍加注意，便可于静观默察中得洞天境界之欢欣。《诗》之国风，如《七月》和《卷耳》等篇，就都是以农事题材为取譬，胡承珙《后笺》称“‘七月’诗历言豳民农桑之事，于其毕也，终岁勤动，乃得斗酒相劳，故此飨断为民自饮酒”。又《毛诗正义》引《周礼》党正注说：“正齿位者，为民三时务农，将阙于礼，至此农隙而教之尊长养老，见孝弟之道也。”可见在诗经时代，就已经有了成熟的农事诗创作。诗骚以降，至魏晋闲人遁入桑丘之野，文学的农事表现便形成一种潮流，一种传统，一种追求理想意趣的中国文学境界。所以我认为，亘古久长的中国文学，文人往往移情于乡间农



事，且不分得意失意独善兼善。其中很重要的根由，在于亚细亚的广袤土壤之上，他们作为普通的社会个体，既植根于农业之疆，又努力想挣脱羊圈的羁绊，企盼到宫廷都市里求取功名以达到心理平衡。然而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恰如儒佛道三种意识在社会思潮中的奇妙混杂，都迫使中国文人终于不得不退处其休养生息的农业本土（物质意义上的退处抑或精神意义上的退处），把理想的天国建构于现实的窘境之上，获得某种超脱和慰藉的意趣，其实也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些生存下去的滋味。它的结果，客观上为中国文学的审美积淀，增添了不可低估的厚重。

以中国诗史观之，大抵作诗好手都曾涉猎农事，若六朝之陶渊明、谢灵运、沈约、江淹、庾信；若唐之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储光羲、张藉、王建、刘禹锡、白居易、司空图、陆龟蒙；若五代之韦庄；若宋之王禹偁、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贺铸、陆游、杨万里、范成大；若金之刘瞻、元好问；若元之耶律楚材、赵孟頫、萨都刺；若明之刘基、高启、于谦、唐寅、吴承恩、纪坤；若清之钱澄之、汪琬、朱彝尊、王士禛、查慎行、纪昀、钱大昕、姚鼐、阮元，如此等等，数不胜数。诚然，那些放情山水或纵论古今的恢宏篇什，往往更能见出激情的袒露和胸臆的直抒，然而这类农事即兴之为，从美学的意义上说，其心理消息的蕴示和艺术审美力的张扬，丝毫不比前者逊色。而纯粹从研究的角度看问题，后者甚至更有价值一些，至少就窥探中国文人的理想图式和

